

## 「台灣腔」態度初探： 資料探勘在語言態度上的應用\*

彭駿逸

紐約市立大學曼哈頓社區學院現代語言學系

### 摘要

本研究透過資料探勘的方式，探討中國網友對於「台灣腔」的刻板印象。「台灣腔」所代表的是台灣華語經過媒體化 (mediatization) 之後，所呈現在中國觀眾前的一種語言型態，而非一般台灣人普遍的說話方式。本研究透過「網路爬蟲」，擷取中國天涯論壇上關於「台灣腔」的討論，建立語料庫，計算詞語間的相關性，並透過詞彙網絡分析 (lexical network analysis) 的視覺化方式，討論中國網友對於台灣腔的語言態度。詞彙網絡分析的結果發現，「可愛」及「做作」為中國網友討論台灣腔時所使用的核心詞彙。本文從媒體與語言的關係出發，討論這些核心詞彙背後的社會意涵。研究的最後將以「台灣腔」為例，分析華語教學中對於「標準」的迷思及語言的意識形態。

**關鍵詞：**大眾文化 風格 語言態度 媒體化 辭彙網絡分析

---

\* 本研究獲得紐約市立大學 Cycle 50 PSC-CUNY Research Award 經費補助，在此致謝。再者，感謝 Nicholas Garcia 與 Sam Sharps 在模型建置方面給予的協助與建議，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與修改建議，使本文更加嚴謹，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1. 緒論

中國官方在 2004 年頒布了「淨化工程」，禁止電視節目主持人使用「港台腔」。隨後許多在大陸發展的台灣藝人也被要求在電視節目中停止使用「港台腔」改說「標準普通話」。但是到底什麼是「港台腔」，卻難有一個明確的定義。香港的主要語言是廣東話，而台灣說的是所謂的「國語」，有時甚至北部和南部人講的國語腔調也都不一樣。因此，「港台腔」指的到底是「港腔」還是「台腔」，又或是為什麼電視節目主持人要刻意在節目中使用「港台腔」，便成為值得討論的議題 (Peng 2018, 2020a)。而在華語教學的現場，口音也一直是華語老師和學生們經常討論的話題。有「台灣腔」的老師有時甚至被要求「正音」，或使用「標準」的「普通話」。但是「標準」如何界定，而什麼又是「台灣腔」，卻很少在文獻中被討論。本研究將透過資料探勘與詞法分析的方法，探討媒體與語言態度的關係，進而分析華語教學中對於「標準」的迷思及語言的意識形態。

「國語」在 1949 年被國民政府帶入台灣之後，受到台灣本土語言的影響，產生了一系列語法和語音上的變化 (Kubler 1981, 1985; Kuo 2005; 何萬順 2010; 蘇席瑤 2018)。Kubler (1981, 1985) 在其研究中提出，台灣華語為華語、閩南語、客家話、日語及其他台灣本土語言接觸的結果。例如，在語法上，台灣華語習慣用「有」作為時貌 (aspect) 的標記，來表示動作的完成，如例 (1)、(2) (蔡維天 2002)。在語音方面，則有「去捲舌化」的現象。「去捲舌化」指的是卷舌音 (retroflex consonants) 在使用時，常常被弱化，也就是 /tʂ/ /tʂʰ/ /ʂ/ (ㄘ ㄘʰ ㄙ) 分別變成 /tʰ/ /tsʰ/ /s/ (ㄊ ㄊʰ ㄌ)。另外，前鼻音 /n/ (ㄣ) 與後鼻音 /ŋ/ (ㄥ) 的區辨也漸漸淡化 (Kuo 2005; 何萬順 2010; 蘇席瑤 2018)，以及輕聲被其他聲調取代 (Zhang 2005)。例如：學生的「生」從輕聲變成一聲、朋友的「友」從輕聲變成三聲。此外，比較近期發展出的特色還包含「啊」、「啦」、「喔」等語尾助詞的使用，也都是台灣普通話常見的語言特徵 (Lin 2014; 蘇席瑤 2018)。但是在台灣一般所認知的「國語」或是「台灣華語」事實上和中國大陸講的「港台腔」或是「台灣腔」又不太一樣 (Peng 2018, 2020a)。

(1) 我有吃過這個。

(2) 你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1970 年代，正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大量的港台電視節目、流行音樂湧

入中國市場。許多香港的粵語電影，透過台灣配音，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許多港星來台灣發展，因此他們所講的華語，也都帶有當時的台灣口音。瓊瑤的戲劇，伴隨著許多現在四、五十歲的中國大陸人度過青春。相對於當時充滿愛國情懷及民族主義色彩的大陸電視節目，年輕人對於港台的大眾媒體更能產生共鳴 (Gold 1993)，台灣也順勢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的重鎮 (Moskowitz 2009)。對於老一輩喜愛港台電視劇的大陸人來說，帶著台灣口音的華語普通話是進步與都會感的象徵 (Zhang 2005, 2017)，因為電視上展演的生活條件與經濟狀況比早年的中國來得好。而那時他們所認知的港台腔，是台灣主播在電視上使用、象徵外省口音的「標準國語」。

近年由於兩岸三地接觸逐漸平凡，中國民眾較能區辨「港腔」與「台腔」的差異，「港台腔」這個名詞也因此逐漸被「台灣腔」取代，而「台灣腔」更被賦予了新的社會意涵。2000 年代，「流星花園」風靡華語區，開啟了偶像劇的風潮，新型態的電視節目開始改變大陸人對於「台灣腔」的看法。偶像劇不僅重新定義了社會大眾對於女性「可愛」及「溫柔」的看法，也勾勒出了一個「暖男」的形象。而在大陸的觀眾的眼中，這樣的戲劇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和「台灣腔」產生連結。因此，「台灣腔」應該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的觀眾透過媒體接觸，對於台灣華語產生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台灣人真實說話的方式 (Peng 2018, 2020a, 2020b)。

本研究透過資料探勘的方式，探討中國網友對於「台灣腔」的刻板印象。「台灣腔」所代表的是台灣華語經過媒體化 (mediatization, Agha 2011) 之後，所呈現在大陸觀眾前的語言型態，而非一般台灣人普遍的講話方式。本研究利用「網路爬蟲」的方式，擷取中國大陸天涯論壇上關於「台灣腔」的討論，建立語料庫，計算詞語間的相關性，並透過詞彙網絡分析 (lexical network analysis) 來討論大陸網友對於台灣腔的語言態度。

## 2. 語言態度與媒體

傳統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認為，媒體不會對語言產生同化作用。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的電視媒體中所播送的大多是「標準英語」，但英語的地域及社會方言卻依舊越來越多樣化。大多數的變異社會語言學家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相信，語言同化的過程多半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接觸，而較少透過媒體接觸而發生 (Chambers 1998; Labov 2001:228)。近期語言人類學家對於這樣的觀點則提出新的看法：雖然媒體對於語言的影響多半無法

直接用計量方法實證，但是輔以質性方法，加入媒體參與度 (media engagement) 以及語言態度等社會要素，仍就可以看到媒體對於語言的影響 (Stuart-Smith, Timmins, Pryce and Gunter 2013; Androutsopoulos 2014; Mortensen, Coupland and Thøgersen 2017)。然而，媒體對於語言態度的影響卻較少在華語的脈絡下被討論。

在語言態度方面，Peng (2018) 利用網路問卷，調查了 234 名 18 至 30 歲，來自中國北方的網友，透過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試人收看台灣電視節目的習慣，以及對於台灣腔以及台灣藝人說話方式的看法。該研究整理出在問卷回覆中，反覆出現的 11 個詞彙：有禮貌、軟、萌、不標準、彆扭、不好聽、溫柔、做作、還行、嗲、好聽。研究者從性別、權力關係以及文化資本 (Bourdieu 1977, 1991) 的角度來詮釋「台灣腔」對於年輕一代的社會意涵。Peng (2020a) 後續的研究證實，若對於台灣的華語有正面的態度，長期觀看台灣電視節目的中國北方受試人更容易接受台灣普通話的語法特徵。而在接下來的研究中 (Peng 2020b) 也發現，媒體接觸也會強化語言特徵與地理區域之間的連結。長期觀看台灣電視節目的中國北方受試人，傾向於把「有」作為時貌標記語這樣的語言特徵和台灣的普通話做連結，儘管這樣的語言特徵也普遍存在於中國南方的普通話當中，如例 (3)。

(3) 我有去過台灣。

Eckert (2008) 提出「拼裝」(Bricolage) 的概念來解釋語言與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拼裝」指的是語言使用者利用來自不同語言的特定特徵來展現獨特的身份認同。例如，Zhang (2005) 的研究發現，在北京跨國企業工作的經理人會在他們的語言當中加入台灣華語、香港廣東話、英語的語言特徵，來強調自己都會化的身份。而相較於跨國企業的經理人，國營企業的經理人，則明顯較少使用這些的語言特徵。Zhang (2017) 將這種以身份塑造為動機，所產生的混合式語言稱之為「都會華語」(Cosmopolitan Mandarin)。這些具有社會意涵的語言特徵，可以幫助使用者用塑造獨特的身份認同。換句話說，身份認同的塑造，不是完全接收某一種語言當中全部的語言特徵，而是使用已被賦予社會意涵的特定特徵，也就是具有顯著性 (saliency) 的語言特徵 (Labov et al. 2011; Levon and Fox 2014)。

顯著性是影響媒體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若比較一個有顯著性及一個沒有顯著性的特徵，則可發現，媒體接觸的影響在沒有顯著性的語言特徵上較

不顯著 (Peng 2020a, 2020b)。舉例來說，標記時貌的「有」(例 3) 和置動詞後的「給」(例 4a) 都是台灣華語的特徵。不過，「有」被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視為是一個顯著的台灣華語特徵，但是置動詞後的「給」則不具有這樣的顯著性，因為許多北方方言也同時允許置於動詞後 (4a) 及動詞前 (4b) 的「給」(Peng 2020c)。研究發現，媒體接觸讓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更加接受「有」(Peng 2020a)，也把「有」和台灣華語做更強烈的連結 (Peng 2020b)，但是在置動詞後的「給」則沒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 (4) a. 我打電話給你。
- b. 我給你打電話。

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閱聽人對於特定語言的態度與刻板印象。從語言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媒體扮演了連結語言符號與社會意涵的角色 (Agha 2005, 2007, 2011)。媒體將個人過去的真实經驗與新的媒體經驗作連結，賦予符號特定的社會意義，強化閱聽大眾對於特定語言的態度或是刻板印象 (Agha 2007)。語言態度與刻板印象的議題在過去的 40 年來一直受到社會語言學家及語言人類學家的關注，研究方法也由早年經典的變語配對實驗 (matched-guise technique) 研究法不斷更新。變語配對實驗最早由加拿大社會心理學家 Lambert、Hodgson、Gardner 與 Fillenbaum (1960) 提出，用來研究加拿大人對於英語及法語的偏見。研究人員先請一位英語和法語的雙語使用者用兩個語言各錄一段音檔，然後告訴受試人這是兩個不同人的聲音，讓受試人來為這兩個人的各項社會條件做評分，包含聰明才智、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等。該研究發現受試人對於說英語的音檔評分較法語高，而變語配對實驗也為之後的語言態度研究廣為使用。後來陸續也有其他研究法，例如 Preston (1993, 2003) 所提出的「大眾語言學」(folk linguistics)，利用地圖來搜集一般大眾對於地域變體的印象。近年來隨著人與網路的互動日益頻繁，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使用資料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與社會相關的議題，進行以文本為數據 (text-as-data) 的研究 (Reyes 2014)。

### 3. 方法與過程

近年來，網絡分析 (network analysis) 已被大量地使用在社會科學的研究 (例如 Palla, Barabási and Vicsek 2007; Borgatti, Mehra, Brass and Labianca 2009; Evans and Aceves 2016)。網絡分析是一種資料視覺化的方式，透過計

算頻率來分析兩個資料點中間的關聯性，用以了解兩個或多個社會變項之間的關聯。例如，Rule、Cointet 與 Bearman (2015) 將之用來分析歷屆美國總統國情咨文的政治言談 (political discourse)，探討美國社會的變遷。他們以約莫每 40 年為一個單位，透過網絡分析可以發現每一個時間段美國社會所關注的重要議題及其歷時性的變化。Kawa、Michelangeli、Clark、Ginsberg 與 MaCarty (2018) 則運用詞彙網絡分析來討論人類學博士畢業生的畢業學校和教職工作的關聯，批判美國學術界的裙帶關係與不平等議題。他們發現，某些學校的畢業生明顯地較容易進入特定學校任教，而這樣的現象也諷刺地顯示出標榜平等的美國學術界不平等的聘用制度。

本研究以文本做為數據，透過網路爬蟲 (web scraping) 與資料探勘 (data-mining)，來分析網路社群中對於台灣腔的討論。網路爬蟲是一種自動化大量擷取線上資料的方式，以擷取的資料建製語料庫，利用資料探勘及視覺化 (visualization) 的技術，來回答相關的研究問題。本文以中國的「天涯論壇」作為資料擷取的平台，不僅因為該論壇為中國用戶最多的網路社區之一，其中「台灣風雲」看版更載有關於台灣各類文化的豐富討論。研究人員首先利用關鍵字「台灣腔」搜尋天涯論壇中所有關於台灣腔討論，再將討論串擷取，進行辭彙網絡分析 (lexical network analysis)。網路爬蟲總共從天涯論壇擷取了 13,062 筆討論串。辭彙網絡分析將網路上所擷取的所有評論視為一語料庫，每一則網路評論視為「詞袋」(bag of words)，詞袋中的每一個詞彙視為一筆資料，字序的部分則不列入考慮。

每一則評論裡的每一個詞都透過「詞頻除以詞數」的方式被賦予一個加權值 (term-frequency,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亦作 TF-IDF)。詞頻的概念是，如果某一個詞彙很密集地出現某些特定的評論當中，代表這個詞彙可能跟「台灣腔」這個主題高度相關。而詞數的概念則相反：如果某一個詞出現在所有的評論當中，代表這個詞可能是人稱代名詞、功能詞等較不具代表性的詞彙，因此與「台灣腔」的關聯性則可能較低。綜合詞頻與詞數，用 TF-IDF 算出來的加權值越高，代表該詞彙跟「台灣腔」這個主題的關聯性較為緊密。

最後，在進行資料視覺化之前，再過濾掉不相關的高頻詞 (例：你、我、他)，以擷取最相關的關鍵字。在反覆試驗之後，本研究擷取了出現在少於 1% 的評論中，最高頻的 1,000 字。詞彙網絡分析透過計算兩個詞彙出現在同一則評論的機率來決定詞彙間的關聯度。若兩個詞彙經常同時出現在一則評

論當中，則被視為高度相關。資料視覺化的過程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用「無監督」(unsupervised) 的方式來建置模型。先使用原始資料，不使用任何預設詞彙。然而，如圖 1 所示，這樣的模型建置方式依舊擷取到過多不相關的詞彙，無法有效提供台灣腔的關聯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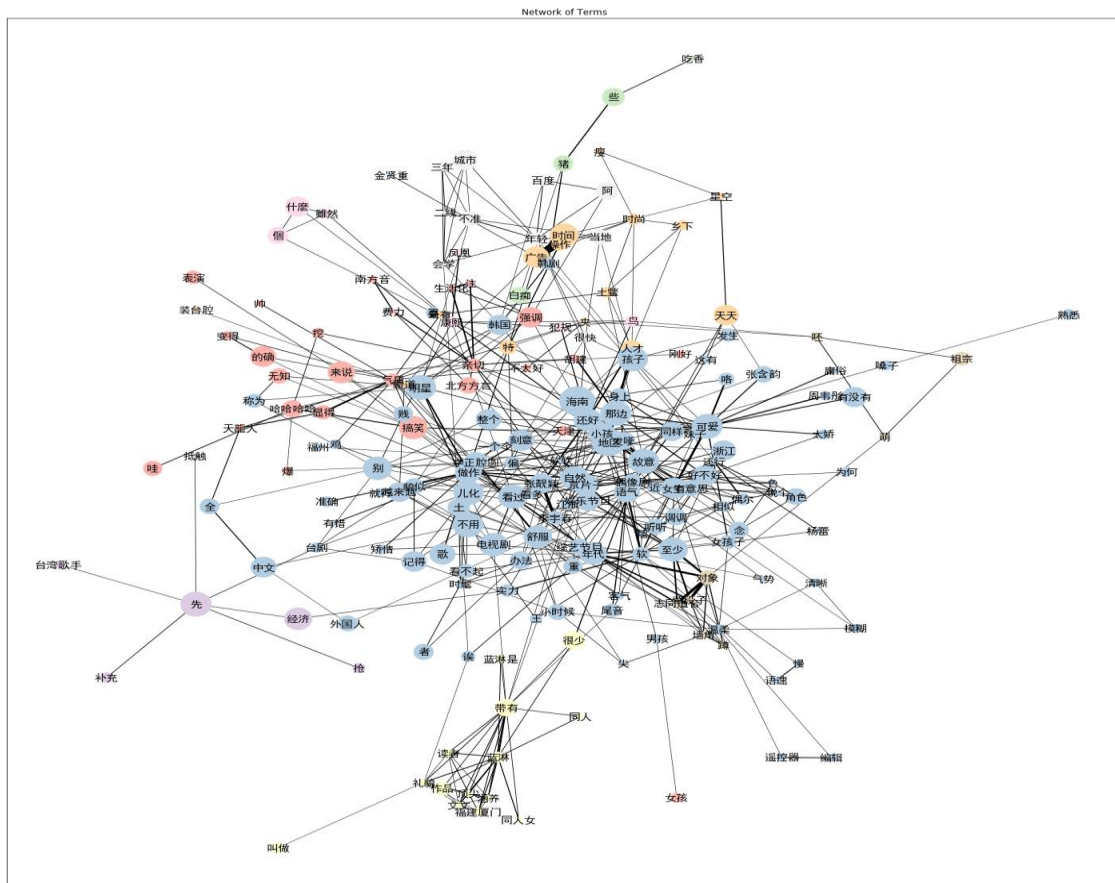


圖 1：「無監督」模型建置

第二階段：監督式模型建置。在模型中標記出 Peng (2018) 所發現的 11 個台灣腔的關聯詞：有禮貌、軟、萌、不標準、彆扭、不好聽、溫柔、做作、還行、嗲、好聽。標記出這 11 個詞只是幫助模型挑選核心詞彙，但不代表這 11 個詞都會被選到。這個階段所建置的模型過濾掉更多不相關的詞彙，由這 11 個關鍵詞向外延伸，讓模型更聚焦在「台灣腔」。

第三階段：最後再加入其他與脈絡相關的詞彙，例如：可愛、康熙、偶像劇、親切、氣質等，讓詞彙網絡更加完整。這些詞彙由作者參考文獻（例如：Su 2008；Peng 2020a）及個人研究經驗而彙整而成。在圖 3 當中，紅色部分代表 Peng（2018）的關鍵詞，綠色部分代表在本階段才加入的脈絡相關詞彙。圓圈的大小表示 TF-IDF 的加權值，圓圈越大，加權值越高，跟台灣腔也越為相關。而連線的粗細則代表兩個詞彙出現在同一則評論當中的頻率，線越粗，則代表出現在同一則評論的頻率越高。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階段當中，除了描述「台灣腔」的核心詞彙之外，模型也找出與核心形容詞相關連的語言特徵。例如：「有沒有」、「好不好」、「哇」、「咯」等。如圖 3 所示，



## 「台灣腔」態度初探：資料探勘在語言態度上的應用

「可愛」和「有沒有」做連結，代表「有沒有」這樣的用法常被大陸網友賦予「可愛」的社會意涵。加入脈絡相關的詞彙讓詞法分析的網絡更為完整，也提供更多中國網友對於「台灣腔」刻板印象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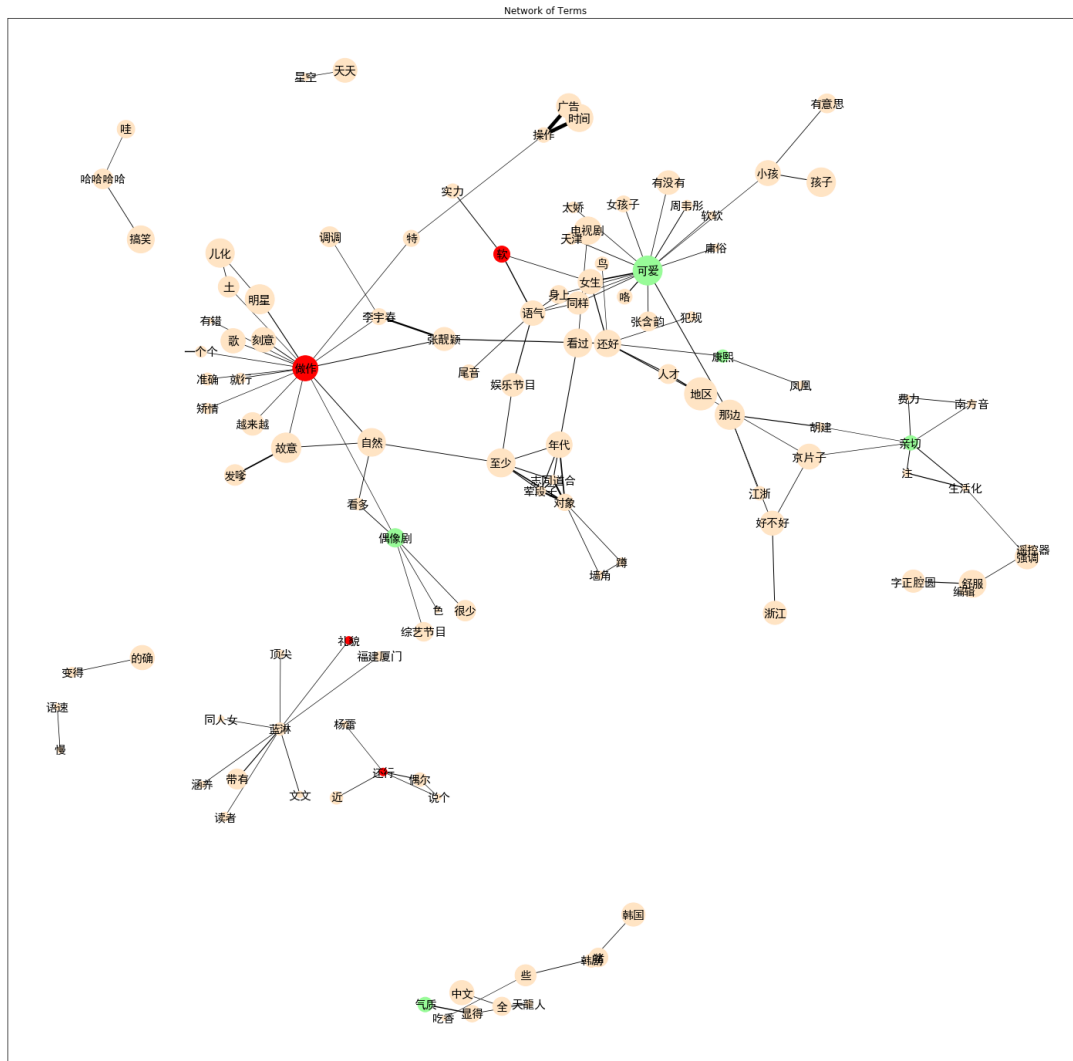


圖 3：「監督式」模型建置搭配脈絡相關詞彙

網路爬蟲蒐集使用者自然生成的大量語料 (user-generated content)，優點是可以避免「觀察者效應」(observer's paradox)，所有的語料皆在自然語境下生成。然而，此方法的限制在於，透過「網路爬蟲」所取得的資料，無法知

道評論人的身份背景，像是性別、年齡、方言背景等等，只能透過網路論壇本身的目標使用者及簡體字來假定評論人多為來自中國的青壯年族群。另外，部分語言學者 (van Dijk 1980; Schuelke-Leech and Barry 2017) 也針對「詞袋」的分析方法提出批評。由於「詞袋」的分析方法不考慮字序，故忽略了核心詞的使用脈絡。然而字詞的使用脈絡也是重要的資料，在去脈絡化的方式下討論核心詞有可能會使得語料的真實樣貌無法忠實呈現。

#### 4. 討論

如圖 3 所示，「可愛」和「做作」為描述台灣腔的核心詞彙。從「可愛」延伸出去，有「女孩子」、「電視劇」、「太嬌」、「軟軟」和「張含韻」等。由此可見，台灣腔很可愛的印象通常來自電視劇，並且多半和女性的角色有關。這可能是由於受到日本大眾文化的影響，台灣社會崇尚一種「可愛式」的女性角色。這類「可愛」文化源自於日本的 *burikko performance* (Miller 2004)，*burikko* 這個字由 *buru-*（假裝）和 *-ko*（女孩）結合而來，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假的女孩」。*Burikko* 的概念類似中文中的「裝可愛」，通常指年輕女性在特定脈絡下表現出模仿「天真可愛」(*fake naivete*) 的語言行為 (*speech act*) (Miller 2004)。Yueh (2016) 也提出「撒嬌文化」的概念來解釋台灣的大眾文化中女性「裝可愛」的表現。這樣的女性角色有別於歐美大眾文化中塑造的女性角色。而這樣的語言行為透過大眾媒體傳送到了中國，則形成了中國網友眼中台灣華語很「嗲」或是很「軟」的刻板印象。

傳統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上，北方人較為陽剛，而南方人較為陰柔。台灣除了繼承了南方的柔軟特質外，也延續日本大眾文化的影響。從詞彙網絡分析的結果發現，很多關鍵詞都與藝人的名字或是電視節目有連結。由此推測，很多刻板印象其實與大眾媒體相關。而這些節目多半為以女性觀眾為主要訴求的偶像劇或是綜藝節目。這些節目多半藉由日本的可愛文化為女性塑造出了一個「可愛」的典範。對於性別刻板印象的強化，是媒體常見的作用之一（參見 Hiramoto and Teo 2014；Queen 2012, 2015）。Agha (2011) 在其媒體化的理論中說明，電視媒體利用既往的集體經驗，來塑造或是強化一個文化形象或是刻板印象。而這個媒體經驗，在往後的真實生活中會再被不斷地運用，進而建立起符號和社會意涵的連結。這樣的連結 Agha (2005, 2007) 稱之為「標記化」(*enregisterment*) (參見蘇席瑤 2018)。

可愛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做作」。如圖 3 所示，從「做作」再擴展出去，則連到「故意」、「自然」、「明星」、「李宇春」和「張靚穎」。若把這些關鍵詞串連起來，可以推測：當明星使用台灣腔的時候，給人做作的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宇春」和「張靚穎」都不是台灣藝人，但是依舊被和台灣腔做連結。一個是可能性是，中國藝人「模仿」台灣腔，所以更加強「做作」或是和其連結的相關社會意涵。另外，由於詞彙網絡分析的結果沒有發現說台灣華語的台灣藝人，更證實了所謂的「台灣腔」很大一部份是媒體與中國閱聽人想像與建構出來的產物。由此可見，「台灣腔」的刻板印象，不僅和台灣人做連結，也和電視媒體中模仿台灣腔的中國藝人做連結，突顯了電視媒體在口音刻板印象產生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然而，「可愛」和「做作」都是針對女性使用台灣腔的刻板印象。如果男性使用類似的語言特徵，則可能被貼上「娘」的標籤。「娘」的另一層意義，就是缺少陽剛性 (masculinity)。而台灣腔很「娘」的刻板印象，或許可歸因於台灣腔的媒體表徵挑戰了傳統中國社會對於陽剛性的定義。近年受到韓流的影響，陽剛性在亞洲的大眾文化當中已逐漸被重新定義。中性化的打扮搭配精緻的妝容，許多亞洲男星以有別於的男性形象出現在媒體上。韓國學者 Jung (2010) 亦提出「多元陽剛性」(versatile masculinity) 以及「混合式陽剛性」(hybrid masculinity) 的概念，作為對於此類陽剛性的非傳統詮釋 (參見 Gough 2001；Hall and Gough 2011；Hall 2015)。而中國網友對於非典型陽剛性的反應則呈現兩極 (Gao 2019)。支持者將之視為傳統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反動，而反對者則以「娘」來形容這樣的非典型陽剛性。這可能與中國國際政經實力的攀升有關。由於陽剛性在父權的脈絡下經常被視為是權力的表徵，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權力提升，則更需彰顯傳統霸權的陽剛性，因而反映在對於非典型陽剛性的反抗。

當然，以上所討論的語言態度或是意識形態都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所產生的。同樣的說話方式，對台灣人來說，甚或是對其他的海外華人，可能都會產生不同的社會解讀 (參見許慧如 2019)。縱使對於同樣的族群，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語言的社會意涵也會有所改變。在 80、90 年代，中國對於港台腔「都會化」的印象也逐漸在改變中 (Peng 2018)。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預算高品質的電視節目如雨後春筍，港台藝人也前仆後繼地前往大陸發展。不難發現，這些港台藝人在大陸節目中已經開始換上對岸的華語口音，港台口音對於年輕一代的大陸觀眾早已失去吸引力。對於多數成長

於大陸一線城市的千禧世代而言，「台灣腔」早已不是都會化的象徵。對於台灣腔的觀感，「嗲」、「裝」、「娘」已經逐漸取代早年的都會與現代感 (Peng 2018, 2020a, 2020b)。

類似的語言態度轉換的現象，也發生在台語或是俗稱的「台灣國語」。在早年的台灣，台語和台灣國語，曾經被賦予許多負面的社會意涵。而在過去的十年，由於本土意識的崛起，讓台語和台灣國語的社會地位大幅翻轉，現在台語或是「台灣國語」已經被視為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充滿親切感，也象徵對台灣的身份認同 (Wei 2008；許慧如 2019)。「台灣國語」的例子說明，語言態度是動態的，它會隨著社會文化的變動而改變。曾經被視為落後、象徵低社經地位的語言，也會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被賦予新的社會意義。事實上，所有的口音都是相對的，因此沒有所謂的標準與不標準，端看以什麼為基準做判斷。從語言科學的角度來說，並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標準。大多數時候，所謂的「標準」只是一個由政府所制定的一套規則。其實語言的本身，並不帶有上述的社會意涵。這些社會意涵，往往是由社會脈絡所創造。社會意涵產生的因素有很多種，可以是權力關係 (power dynamics)、也有可能是語言使用者的社會階級，亦或是語言使用者個人的身份認同 (identity) (Bucholtz and Hall 2003)。

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1977, 1991) 所提出文化資本理論清楚地解釋了這個現象：語言交流就像是一個市場，當一個人使用的語言較接近社會所認定的「標準」時，此人具有的文化資本則較多，因為這個語言可能會帶來社會上的優勢，例如求職，或是談生意。反之，此人的文化資本則較少。不過，「台灣腔」雖然非中國官方認定的標準語言，但依舊被許多中國藝人模仿，作為一種用來創造個人風格的語言資源。這代表雖然「標準」語言確實是一種文化資本，但所謂的「非標準語」在實際社會互動上，仍然有其價值，及其可運用的社會資本。語言學用科學的方式證明，每個語言在本質上其實都是一樣的，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每種語言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卻都被賦予了不一樣的社會價值。而這些價值是動態的，會隨著社會環境及時空背景而改變，就如同中國人對於台灣腔的態度一樣。事實上，無論是「港台腔」，還是「台灣腔」，都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腔調，而是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透過媒體建構出一種語言風格 (style) 及對於台灣人說話方式的一種想像。

## 5. 教學上的啟示與應用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將社會意涵與語言本體分離，旨在拆解我們對於語言使用的偏見。本研究希望透過社會語言學對於口音的解構，重新定義許多華語教師心目中對於「標準」與「不標準」的刻板印象與偏見。語言教師需要了解中國對於「台灣腔」觀感的成因，在教學上才能讓學生理解這樣的意識形態（亦參見 Blake and Cutler 2003）。這類的討論不僅可以激發課堂上的互動，也可以跟學生們自己的語言做對比，反思自己的語言意識形態，進而刺激對於語言的批判性思考。另外，學生亦可將語言風格與腔調變成他們可以運用的工具，或是在觀看中國的娛樂節目時，注意到腔調的使用，以及這樣的腔調在文化脈絡下的意義，進行增進學生對於文本或言談的理解。

事實上，語言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有的語言或是「口音」都有其系統性，「好聽」、「不好聽」、「標準」、「不標準」其實都是人或是社會賦予的標準，跟語言的本質無關 (Lippi-Green 1997)。語言教師也應該用更兼容的心態來看待口音，甚至是對語言教師本身的口音要求。華語由於受到各地方的影響，也已產生各種不同的變體，許多來自台灣以及中國各地的華語老師，都帶有自己的地域特色的口音。這些口音應該被帶進課堂中，讓學生了解語言的多樣性，而不是將這些口音視為「不標準」或是賦予負面的社會意涵。

## 6. 結論

本文透過資料探勘以及網絡分析，從跨地域的角度，討論年輕一代的中國網友對於「台灣腔」的刻板印象。「台灣腔」其實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腔調，而是中國人透過媒體建構出的一種語言風格，以及對於台灣人說話方式的一種刻板印象。而電視媒體則在語言刻板印象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網絡分析的結果發現，「可愛」和「做作」是網路上對於「台灣腔」討論的兩大主軸，而這兩個主軸也都與電視媒體緊密連結。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於媒體中「台灣腔」的社會觀感也隨著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而改變。70 年代，中國人認為帶有「都會感」的「港台腔」，也已逐漸轉變為「可愛」和「做作」的「台灣腔」。本研究以台灣腔為例，說明語言的社會意義其實是一個由社會加諸到語言的動態概念，與語言本身的特徵沒有太多關係。而華語教學中的「標準」與「不標準」也是政治意義大於語言本身的意義。口音事實上代表的是一種身份認同，因此無論是在師資培訓還是教學上，老師們對口音都應該採取更兼容的態度。標準與否，其實

都是動態的語言態度。

由於網路的大量使用及數據科學的發展，語言態度的研究在方法上，逐漸和電腦媒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與資料探勘做結合，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透過分析使用者生成的大量自然語料來回答相關的研究問題。相較於傳統的訪談和實驗，資料探勘能夠採集大樣本，結果也更具代表性。在研究對象上，也從較主流的口音逐漸轉向弱勢人群的口音，例如移工與新住民，期待透過研究來提升大眾對於弱勢族群的認識，降低偏見，進而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

## 引用文獻

- Androutsopoulos, Jannis. 2014. *Mediatiz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Change*.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 Agha, Asif. 2005. Voice, footing, enregistermen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5.1: 38-59.
- Agha, Asif.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gha, Asif. 2011. Meet mediatizatio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1.3: 163-170.
- Blake, Renée, and Cecilia Cutler. 2003. AAE and variation in teachers' attitudes: A question of school philosophy?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4.2: 163-194.
- Borgatti, Stephen P., Ajay Mehra, Daniel J. Brass, and Giuseppe Labianca. 2009.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3.5916: 892-895.
- Bourdieu, Pierre. 1977. The economics of linguistic exchang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6: 645-68.
- Bourdieu, Pierre.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by John B. Thompson, translated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2003. Language and identity.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ed. by Alessandro Duranti, 369-39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Eckert, Penelope. 2008. 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453-476.

- Evans, James A., and Pedro Aceves. 2016. Machine translation- mining text for social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21-50.
- Gao, Helen. 2019. 'Little fresh meat'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masculinity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online, April 26,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12/opinion/little-fresh-meat-china.html>.
- Gold, Thomas B. 1993. Go with your feelings: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07-925.
- Gough, Brendan. 2001. "Biting Your Tongue":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0: 169-185.
- Hall, Matthew. 2015. *Metrosexual Masculinities*. UK: Palgrave Macmillan.
- Hall, Matthew, and Brendan Gough. 2011. Magazine and reader constructions of 'metr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A membership categoris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1: 67-86.
- Hiramoto, Mie, and Cherise Shi Ling Teo. 2014. I am the invincible sword goddess: Mediatization of Chinese gender ideology through female Kung-Fu practitioners in films. *Societies* 4.3: 477-505.
- Jung, Sun. 2010. *Korean Masculinities and Transcultural Consumption: Yonsama, Rain, Oldboy, K-Pop Ido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awa, Nicholas C., José A. Clavijo Michelangeli, Jessica L. Clark, Daniel Ginsberg, and Christopher MaCarty. 2018. The social network of US academic Anthropology and its inequali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1.1: 14-29.
- Kubler, Cornelius C. 1981.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 Kubler, Cornelius C. 1985. The influence of Southern Min on the Mandarin of Taiwa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27.2: 156-176.
- Kuo, Yun-hsuan. 2005. *New Dialect Formation: The Case of Taiwanese Mandarin*.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Ph. D. dissertation.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2: Soci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 Labov, William, Sharon Ash, Maya Ravindranath, Tracey Weldon, Maciej Baranowski, and Naomi Nagy. 2011. Properties of the sociolinguistic

- monitor.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5.4: 431-463.
- Lambert, Wallace E., Richard C. Hodgson, Robert C. Gardner, and Stanley Fillenbaum. 1960.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 44-51.
- Levon, Erez, and Sue Fox. 2014. Salience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monitor: A case study of (ING) and TH-fronting in Britain.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42: 185-217.
- Lin, Chin-hui. 2014. *Utterance-Final Particles in Taiwan Mandarin: Contact, Context and Core Functions*.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ppi-Green, Rosina. 1997. *English with an Accent*. New York: Routledge.
- Miller, Laura. 2004. You're doing burikko! Censoring/ scrutinising artificers of cute femininity in Japanese. *Japanese Language, Gender, and Ideology: Cultural Models and Real People*, eds. by Shigeko Okamoto, and Janet S. Shibamoto, 148-16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tensen, Janus, Nikolas Coupland, and Jacob Thøgersen. (eds.) 2017. *Style, Mediation and Chang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alking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skowitz, Marc L. 2009.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Palla, Gergely,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and Tamás Vicsek. 2007. Quantifying social group evolution. *Nature* 446.7136: 664-667.
- Peng, Chun-yi. 2018. Mediatized Taiwan Mandarin: Social perceptions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9.2: 162-183.
- Peng, Chun-yi. 2020a. The effects of media exposur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n grammaticality judgments. *Global Chinese* 6.1: 69-95.
- Peng, Chun-yi. 2020b. Effects of media exposure on regional associations: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aspectual you. *Chinese Semiotics Studies* 16.3: 239-343.
- Peng, Chun-yi. 2020c. The placement of co-verb *gei* in spoken Mandarin Varieties: A study on regional influences.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11.2: 339-358.
- Preston, Dennis R. 1993. Folk dialectology. *American Dialect Research*, ed. by



- Dennis R. Preston, 333-378.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 Preston, Dennis R. 2003. Language with an Attitude.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eds. by Jack Chambers, Peter Trudgill, and Natalie Schilling-Estes, 40-66. Hoboken,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 Queen, Robin, 2012. Days of our lives. Language on a daytime drama. *Gender and Language* 6.1: 151-178.
- Queen, Robin. 2015. *Vox Popular: The Surprising Life of Language in the Media*.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 Reyes, Angela. 2014.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n 2013: Super-New-Big.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6.2: 366-378.
- Rule, Alix, Jean-Philippe Cointet, and Peter S. Bearman. 2015. Lexical shifts, substantiv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State of the Union discourse, 1790-2014.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35: 10837-10844.
- Schuelke-Leech, Beth-Anne, and Betsy Barry. 2017.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ext data analytics. *Frontiers in Data Science*, eds. by Matthias Dehmer, and Frank Emmert-Streib, 147-170.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 Stuart-Smith, Jane, Claire Timmins, Gwilym Pryce, and Barrie Gunter. 2013. Television can also be a factor in language change: Evidence from an urban dialect. *Language* 89: 501-536.
- Su, Hsi-yao. 2008.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girl with *qizhi*?: Refinement, gender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3: 334-358.
- Van Dijk, Teun A. 1980. *Macrostructur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New Jersey: Erlbaum.
- Wei, Jennifer M. 2008.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Yueh, Hsin-I. Sydney. 2016.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A Sajian Genera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Zhang, Qing. 2005. A Chinese yuppie in Beijing. *Language in Society* 34: 431-466.

- Zhang, Qing. 2017.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Undoing Commonness through Cosmopolitan Mandarin*. New York: Routledge.
- 何萬順。2010。〈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澳門語言學刊》，第 35 卷第 1 期，19-29。[Her, One-soon. 2010.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Taiwan Mandarin.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5.1: 19-29.]
- 蘇席瑤。2018。〈臺灣華語的在地化及標記化〉，《臺灣學誌》，第 17 期，1-35。[Su, Hsi-yao. 2018. The indigenization and enregisterment of Taiwan Mandarin. *Monumenta Taiwanica* 17: 1-35.]
- 許慧如。2019。〈後國語運動的語言態度：台灣年輕人對五種華語口音的態度調查〉，《台灣語文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217-254。[Hsu, Hui-ju. 2016. Taiwanese's attitudes towards five frequent variations in Mandarin. *Project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2: 217-254.]
- 蔡維天。2002。〈台灣國語和方言中的「有」：談語法學中的社會因緣與歷史意識〉，《清華學報》，第 32 卷第 2 期，495-528。[Tsai, Wei-tien. 2002. You "have" in Taiwan Mandarin and dialects: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grammatical theorie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2.2: 495-528.]

[審查：2020.6.30 修改：2020.8.6 接受：2020.9.7]

彭駿逸

Chun-Yi PENG

10007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錢伯斯街 199 號

紐約市立大學曼哈頓社區學院現代語言學系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Borough of 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 Chambers St. New York, NY 10007, U.S.A.

cpeng@bmcc.cuny.edu

**Mediatized Taiwanese Mandarin:  
A Text-mining Approach to Language Attitudes**

**Chun-Yi PENG**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Borough of 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ext-mining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Chinese mainlanders' attitudes toward *taiwanqiang*, a mediatized variety of Taiwanese Mandarin. A corpus was constructed with 13,062 comments scraped from a Chinese online forum about *taiwanqiang* and Taiwanese TV shows. Finally, key qualifiers (e.g. babyish, cute, and pretentious) were visualized as a 'lexical network' with links between words or phrases to discover thematic or conceptual categories semiotically linked to *taiwanqia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media and language attitudes, this study debunks the myth of 'standard languag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language attitudes, lexical network, mediatization, popular culture, style